

聂老·回忆录

前妻



孔祥明

聂卫平,是许多人不会陌生的名字,对我与他的近12年婚姻,外界凭猜测或只言片语编写了一个个美丽的“故事”,或一件件扭曲的事实。我没有权力,也没有必要对这些加以申诉和辩解。

我真心希望新闻媒体不要去追根寻底,为了减少那些无根据的猜测和谣言,我在朋友劝说下,最终提笔写下了我的这段情和缘。

孔祥明,生于四川成都,中国赶超日本女子围棋的第一人。她和聂卫平在黑白子间相识、相知、相爱,他们的婚姻如同一盘棋。

应该说,我在孩提时代就认识了聂卫平。那时他代表北京队,我代表四川队参加全国少年儿童围棋比赛,我们除了在领奖台前知道了对方的名字,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印象了。

## 初识·围棋做了“红娘”

1973年,国家体委成立了国家围棋集训队,将各省市的围棋尖子集聚到北京。在集训队里,我可以说是比较用功的,而聂卫平是最刻苦的,一有空他就抓人下快棋。实在找不着对手时,我便成了他的“磨刀石”。这样的事多了之后,队上便有了些“风言风语”,我是又惊又怕。

谈恋爱在那个年代可是严重违纪的,更何况我还不懂得恋爱,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搭理他了。就是不得不说话时,也一定语气尖刻,火药味十足,好像只有这样,才能证明我们之间的清白似的。聂卫平此时也听到一些谣传,从此之后,两人就再也无法平和相处了。别说盘外嘴仗,就是对局完的复盘,两人也一定要吵得脸红筋胀才算罢休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多年。后来,国家集训队改为国家围棋队,搬进了国家体委训练局,我与聂卫平之间的矛盾才渐渐

有点和缓。

当时,聂卫平已与后来入队的何晓任确定了恋爱关系,大家都等着他们什么时候办喜事,我也就少了舆论的顾虑。就在谁都以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时,两人却在最后因性格差异而分了手。这其中的原因我是过了好几年才从聂卫平口中知道的,何晓任却一度误认为是因为我的存在,破坏了她的姻缘,这叫我既委屈又难过。然而,后来的结果却正如她的猜测,我就更是有口难辩了。

我确实不明白聂卫平为什么会在众多花园中游览了一番之后,竟选择了我这个又倔强,又不起眼,又不惹人爱的“丑鸭子”,但我至今也记得,当我最后决定答应和聂卫平走到一起时,我亲自去告诉晓任,征求她的同意,也希望得到她的理解,她真诚地祝福了我,使我心中释然了一片阴霾。

跟聂卫平可以说没谈恋爱就结婚了,我们之间真正的红娘就是围棋。那时,我们除了平时都在国家队训练、生活外,还一起去外地比赛,也常常一块儿出访日本。

关系改善了,在一起的时间又多了,在一起也不外乎是下棋,做死活题,永不改变的内容。谈的、做的、想的都是棋。两人在对方的眼中已不再讨厌,而慢慢变得可爱起来。于是,在某一天下快棋时,聂卫平突然冒出一句:“我喜欢你。”我才发现心中也有了他,怔怔地看了他半晌,无言地走回了自己的宿舍。想了很久才明白,这就叫恋爱。

初恋的兴奋与幼稚,改变了我本立志要做棋手的命运。那时,如果稍稍有点头脑想想,就会明白,我俩在一起是最不合适的。

## 姻缘·失去自我的代价

当时热恋中的我,不知晓人生艰辛,也没有一点点社会经验。以为爱就可以代替一切,更误认为爱就是永恒。从没去细想,我与聂卫平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棋,若没有了棋,也就失去了共同点。可惜,这个问题我在离婚后好久才想明白。

在各方面极力反对下,我还是和聂卫平结婚了。1979年秋,我和聂卫平在成都春熙路办事处办了结婚登记,1980年3月举行了婚礼。平时都住在国家队的宿舍里,周末便回他父母家中,在那儿建了个小窝。新婚蜜月,没有花前月下,我们的时间仍然花在了棋上,日子过得虽说有些单调,但却很温馨、很充实、很甜蜜。

很有女人缘的聂卫平现在终日痴守着我,我仿佛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“伟人”,太了不得了,以为这就是爱的力量。我收敛了自己的好胜争强,从实践中学会了所有家务。让我双手的操劳,换来他的一身轻松,甚至连倒开水、洗手绢都不用他动手。聂卫平为此很满足,我也就更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
于是慢慢地,我生活重心就只围绕着他一个人转,害得朋友们都为我担心,说聂卫平今天对我笑,那我这一天都是阳光灿烂;若是哪天聂卫平对我冷漠,那我便是脸上冰霜、黯然阴沉。连国家队的队友们也慢慢了解到一个规律,倘若我冷着脸,一开口就呛人的话,并不一定是对说话者有什么过不去,而肯定是和聂卫平闹不愉快了。

为此,我不知得罪了多少人,伤害了多少人,这真不是可以用年轻幼稚来开脱的错误。那时我的心里只有聂卫平一个人。注意力过度集

中,且不说我这样不仅疏远家人朋友,失去了自己,就是对聂卫平来说,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爱是不可过量的,但懂得这一点,却是在十几年后我儿子教我的。

太多的爱成为了他的负担,过多的关心成为了他的累赘。可我在很多年里,却一直为此沾沾自喜,认为自己领会了爱的真谛。其实,这正好是违背了爱的原则,过多地去爱,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爱,爱便不成其为爱。在承受了婚变的打击后,我才从内心深处去对自己进行反省,思考自己的毛病,也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性格。

我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,在我放弃自己时,就已经开始放弃两个人的感情基础了。后来,我慢慢醒悟,聂卫平的成功就是聂卫平的成功,我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。成功与失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,其间的反差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,这是对当初选择了事业,又不忠于自己事业的人的惩罚。你若放弃了事业,放弃了自己,那生活也会放弃你。

## 孩子·没能拴住他的心

可以说,不管是在我怀孕生孩子,还是在与聂卫平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中,只要我在,连手绢我也没让聂卫平洗过。我的要强锻炼了我的生活能力,但却影响了儿子的发育。在我肚子前的前八个月,儿子没有感受到关心和爱,感受到的只是紧张比赛的压力,以及为诸多事情的烦恼和悲伤。孩子还没有出世,就已经在经历苦难了。

聂卫平家是个大家庭,上有两个姐姐,下有两个弟弟,加上聂卫平共五姐弟,他们各自成家后就是10个人,加上父母、侄女,共13口人住在一起,热闹是热闹,也少不了矛盾。

坐月子那段时间,聂卫平每周回来我们一次,他无力去平息父母间的战火,也无力将我们母子从这硝烟中接出去。他不无动情地对我说:“小孔,你受苦了,我将来一定好好报答你。”有他这句话,我心足矣。再说了,这是我的孩子,我吃点苦算什么!

聂卫平希望孩子的名字中有个“聪”字,我爸爸便起了聂和聪、聂云聪这两个名字供我们选择。前者平和聪明,后者是云中骏马。聂卫平选了后者。“聪聪”便成了我们儿子的小名。

1982年年底,在聂卫平的努力下,在许多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关心下,我们终于在北京蒲黄榆小区有了一个自己的家。那是一套很小的老式三室一厅住房。接来了我爸爸,请了一位保姆,加上我们夫妻和儿子,五个人把它挤得满满的。

缺鱼、缺锌、缺钙,使儿子常常晚上不好好睡觉。聂卫平嫌他吵闹,时时发火,我便抱着儿子在床边的小空间里慢慢踱步,只要丈夫能睡好,儿子能安静,这点辛苦我不在乎。最累的是冬天带孩子去医院,他裹得像个棉球,我也穿得厚厚的。深夜,抱着儿子走两三站路去医院,那手臂的酸痛滋味至今仍然能清晰地感觉到。

孩子多病,磨炼了我的生活能力。儿子渐渐长大,也使我爱的天平开始发生倾斜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儿子三岁,我们把他送到天坛附近的一所托儿所,这还是托熟人开后门才进去的。可孩子打死也不肯去,每次送都要费好大的劲。母子俩就在这每天来回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里,加深了了解,加深了感情。

聂卫平很疼爱他这个儿子,可方法不对,也没有原则。高兴时任凭孩

子无理取闹,心烦时就给孩子一顿劈头责骂,事后又觉有愧,不断跟孩子说“对不起”,但下一次依然如此。儿子一有不适,麻烦就由我全部承担。对聂卫平来说,儿子是个活着的大玩具,经常和儿子争得脸红筋涨。我怜惜丈夫又心疼儿子,常常不偏不倚地去处理他们父子的纠纷。我每每暗思,我是不是养了两个儿子?

孩子犯了错误,聂卫平拍他屁股几下,还不是真打,他便瞪着眼,用愤恨的目光表示不满。有一次我出外办事,把孩子交给聂卫平带。那时训练局大楼前有道大铁门,门栏底下有道宽缝,一些孩子在那里爬进爬出玩。4岁的儿子来了兴趣,也要去爬,聂卫平没同意,他便让聂卫平去爬。这怎么行,聂卫平便凶了他几句,这下可惹了“大祸”。他尖利的哭声扰乱了整幢大楼的安静。路过大门的各队教练、运动员都会停下来哄哄劝劝。聂卫平软的、硬的全试过了,都不管用。直到两个多小时后我回来了,孩子才委屈地扑在我怀里直说他爸的不是才算歇气。

聂卫平那时一个月有两三次周末去陪首长们打桥牌,有时我也带着儿子陪他去。随着家和儿子越来越多牵扯我的精力与爱心,我对聂卫平的关心相对就少了。我陪他出去的时间越来越少,他独自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,在平静而又已显疲惫的婚姻生活外,聂卫平又产生了对花红柳绿的趣味。

## 情尽·在他最高光之时

1985年中日擂台赛开始了。从此,围棋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,掀起了围棋热的浪潮。这不仅是老一辈领导的关心与支持,也是几代围棋工作者付出辛勤汗水的结果。作为棋手,我们谁不为之感到欣慰呢?谁不为之感到热血沸腾呢?擂台赛成为了中国围棋突飞猛进的起跑线和奠基石,也成为了聂卫平大展身手的舞台。

擂台赛谱写了中国的围棋史,改变了聂卫平的命运,也改变了我们婚姻的走向。每第一届擂台赛,我们上场的虽只有八名队员,但全队都在齐心协力地备战,都在为每一位上场队员出主意、提建议。“打好比赛,为祖国争光。”为了这个共同心愿,大家都在日夜忙于操练。作为聂卫平的妻子,更作为一名棋手,我理所当然要助他一臂之力。

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对手的棋谱都收集在一起,自己先打一遍,有了体会,再向他提出我的建议。我们会为某一着走法半夜惊醒反复研究;我们会对某一种布局反复实践;我们会从无数盘棋中找出对方行棋的规律;我们还会从对方近来的成绩、喜好的走法去推测对方的心理。我们会为自己的不足加紧备战,也因对方强大而不断激励警醒自己……

应该说,不论是在中国围棋史上,还是在推动围棋运动普及方面,聂卫平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勋。这一点,不管到什么时候,人们都不应该忘记。赞美和祝贺的浪潮将一个棋手捧为了圣人,在聂卫平还没有将他的棋才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时,糖水便把他淹没了。我在社会洪流的强大冲击面前,拉不住聂卫平的手。本来,作为一个普通的人,他自身有太多的欠缺与不足,可社会却把他说他十全九美,而那仅剩的一点不美,也只是生活上的无能,这能不让他得意忘形、忘记自我吗?

外面精彩的世界松懈了聂卫平的斗志,他热衷于各种应酬,连正常

的训练也成了一种应时的摆设。他的虚荣心,他的成就感,他的爱好欲望,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,可离围棋却一天比一天远。我苦口婆心地说教,在他听来是最烦人的噪音。他渐渐难以容忍我的规劝,总是尽量回避与我在一起。

从擂台比赛一开始,我就失去了和聂卫平争吵的机会与时间,因为要保证他有良好的心情去备战、去比赛,这也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。心中积压了多少压力,只有天知我知。等到三届擂台比赛结束后,好像一切都有了质的改变,我对他的不满和怨气与外界对他的大肆赞扬格格不入,显得那么不合时宜。

我转业后,便主动脱离了国家队。当时我身为国家队的少年队主教练,撇下一大堆工作不向任何人打个招呼,就这样不辞而别,于情于理都不合,这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做法怎么批评也不过分。训练局领导十分恼火,责成围棋队写个报告。在聂卫平也参加的队干部会上,围棋队撰写了一份汇报书。汇报中声明聂卫平对此事,事前一无所知,所有的事都是我背着他干的。因此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受到国家体委的通报批评,围棋队的前辈和队员们也因此对我很反感。

当时,聂卫平已经萌生了离婚的念头,许多人都认为,一个狂妄自大、遇到这么大的事都不跟丈夫商量的女人,离了,是正确的选择。

## 离开·是终点也是起点

终于有一天,聂卫平冷静地对我说:“小孔,你支持、帮助了我这么多年,我很感激你。但我已不爱你了,我们分手吧。”不管我是多么不甘心、不情愿,我与聂卫平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日趋破裂。痛苦、愤恨、哀怨、后悔、绝望,各种烦恼搅得我一天安宁。

1990年上半年,我答应了聂卫平的要求,同意离婚。这的确是一个明智而又正确的选择。长痛不如短痛,在感情上尤其应该如此。聂卫平好像觉得有些对不起我们母子俩,同时,也希望此事不要影响他的英雄形象。于是,他提出了希望我和儿子出国的建议。我接受了,倒不是为聂卫平,而是为了儿子尽量少承担因为我们的离婚,社会和环境对他的压力。

聂卫平说得很清楚,他感谢我多年对他的帮助和扶持,但他已经不爱我了,我们的婚姻虽然合法,但却不合理。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前一个晚上,我带着儿子,请聂卫平在北京蒲黄榆小区一家烤肉店吃了一顿最后的团圆饭。我们明日就将成为路人,这11年的婚姻岁月有多少话想说,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。我把对他的担心与期望写在一封长长的信里,一封祝贺他生日的信里,可惜他没有拿走,这封信就只有留给儿子了。

办离婚手续的当天,儿子似乎有不祥的预感,死活不离开我半步,就是上厕所也得一块儿去。左哄右骗,我们一番烟偷偷出了门,一刻钟后,我们已成路人。刚出办事处,就见儿子哭得像个疯子似的在街上狂奔,儿子哭着问:“妈妈,你们来这干吗?为什么要背着我?”面对儿子的质问,我无言以对。无声地抱起他,快步地离去。聂卫平也找不到适当的语言,默默地骑上车远去了。

离婚,是夫妻的终点,但也是我和儿子的新起点。不管前途如何,我们都要顽强地走下去。因为,我们只有这一条路。